

# 毛泽东社会理想观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超越

杜菊辉<sup>①</sup>

(湖南工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毛泽东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归者, 他在吸收传统“大同”思想合理因素的同时, 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难能可贵的超越。比如: 他把传统的具有空想色彩的大同理想升华为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 把传统道德上的平等平均思想发展为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平等观, 把传统的公有思想提升为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公有制, 把传统的人道和谐原则发展为革命的人道主义。虽然毛泽东晚年在实践中操之过急, 出现了重大失误, 但是他在理论认识上的超越是不能否认的。

**关键词:** 毛泽东; 社会理想观; “大同”思想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1-0028-05

## MAO Ze-dong's Social Ideal Transcends Traditional Chinese "Datong" Ideal

DU Juhui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Theori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was not just an inherito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hile absorbing traditional "Datong" ideology its reasonable factors, he surpassed and made valuable improvements in many respects. For instance, the traditional Datong idea full of Utopian dreams was elevated by him to become the scientific communist ideal, the traditional equality and evenness in morality was developed into socialist social equality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 the traditional public thought to the public ownership with certain possible reliability, and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humanist harmony into revolutionary humanism. Although he made some serious mistakes at his old age being too hasty in practice, the fact that he transcended in theoretic ideology can not be denied.

**Key words** MAO Ze-dong social ideal "Datong" thought

毛泽东社会理想观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思想根源, 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烙印, 人们对此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 但是, 我们也应看到毛泽东对传统“大同”思想实现了很多的超越。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 就不可能客观评价毛泽东社会理想观, 也不可能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社会理想观在继承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基础上, 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实现了超越。

一、把传统的具有空想色彩的大同理想升华为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

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 向来以极大的热情

去描述理想社会, 在他们的著述中, 充满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就有所反映, 到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学说对理想社会都有具体的描述。道家经典《道德经》描绘的是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在这样的世界里, 国家要小, 人民要少, “使什伯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有车舟无所乘之, 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 乐其俗, 安其居。邻邦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sup>[1]</sup>墨家经典《墨子·兼爱》提出了“兼爱”的社会理想。所谓“兼爱”, 就是“视人之国, 若视其国。视人之家,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09-10-12

作者简介: 杜菊辉(1963-), 女, 湖南湘阴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毛泽东思想研究。

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最终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动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sup>[2]</sup>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勾画了一个美妙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sup>[3]</sup>

到了近代,洪秀全接受了古代大同思想,并把它与西方基督教中某些平等观念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太平世界,企图建立天下一家的理想国家。《天朝田亩制度》设计了“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传统的大同思想,而且直接借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设计蓝图的著作。他依据《春秋公羊传》,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试图寻找一条合乎“公理”的“去苦求乐”的途径,他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sup>[4]</sup>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朝封建统后,中国何去何从?为解决这个问题,革命派也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集中体现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孙中山将民生主义具体地理解为“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来看,其民生主义最大的特征不是立足于如何发展,而是立足于如何防止欧美问题在中国的重演,其实质是以平等平均的理论原则取代历史准则。故列宁评价说:孙中山是主观上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

传统的“大同”思想曾经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接触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后来他对斯诺谈到这段往事时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下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sup>[5]</sup>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sup>[6]</sup><sup>89</sup>这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盲目地接受这种思想,也曾有过理性的分析、批判。1917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就将大同说斥之为谬误之理想,他说:“然而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

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倡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他还分析了大同之说存在的心理基础,断言它象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一样,是虚幻的。他甚至断言人们将不堪大同之境况,并否定了自己曾有过的梦想。他说:“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理想之境遇而已。”“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sup>[6]</sup>184-185

毛泽东后来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实现大同理想的正确途径和力量,使几千年的大同梦由空想化为现实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实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曾不无遗憾地评价以往的空想主义者:“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sup>[7]</sup><sup>1471</sup>但当历史的使命压到了我国无产阶级肩上时,毛泽东认清了:当民族尚未独立时,民族独立是当务之急,因它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一旦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则进一步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sup>[7]</sup><sup>1471</sup>从而扬弃了青年时代的大同思想。在此还可以看出,毛泽东也继承了孙中山把大同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的思想,但又因找到了到达大同理想的正确途径和力量而超越了孙中山,从而把传统的具有空想色彩的大同理想升华为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

## 二、把传统道德上的平等平均思想发展为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平等观

“均平”观念是传统大同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到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再到道家的原始共产主义理想;从东汉末年的“太平”教义到唐宋时期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再到李自成“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经过千百年思想家的提炼和农民革命战争的培育,形成了这种历史悠久的思想和意识。但是,中国是一个具有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度,对君权的限制缺乏外在的力

量,急需借助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道德使命感以及他们所营构的以民本主义为大旨的道德理想模式。因此,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里,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道德担当意识,这也导致他们在建构大同理想时,更多的是从道德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总观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我们不难发现:理想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更注重伦理层面,更多的是从道德上的平等、平均的要求出发来建构其理想社会,而不是注重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即“不患寡而患不均”。

传统“大同”理想的潜意识作用,使得近代中国人在追求理想社会时,也主要把社会理想当作道德理想来看待,使得他们追求的理想社会最主要的内容是平均主义的平等。洪秀全谋求建立的是一个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平均主义为平等目标的道德化的理想社会。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也是以平等为最高价值的道德理想。孙中山也同样是以平等的道德理想作为最根本的追求目标。既然追求的大同是以平均主义为平等的道德理想,那么,它的实行就无须以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为前提,这是近代大同思想家们必然会得出的结论,也正是他们追求社会理想受挫的症结所在。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才能随之进步,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水准才能相应提高。脱离了生产力这一根本要素来追求大同理想的实现是永无可能的。

传统大同理想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曾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青年毛泽东的“新村”计划是他的主观设想,这个“新村”实际上是一个保证人人有书可读,有工可做,人人地位平等的基层社会组织。后来的人民公社可谓晚年毛泽东按“新村”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主观设计。他认为,有了这种公社,就可以消除由于社会分工而造成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毛泽东晚年的“五七”指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半封闭、小而全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各行、各业、各单位、各企业都要兼及他业,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其主要目的也是要消灭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然而,毛泽东毕竟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归者,他在吸收“均平”观念合理因素的同时,很早就对“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批判。他在1929年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了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现象,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

产物”、“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因此“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sup>[8]</sup>他在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将赞同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同提倡绝对平均主义区别开来,认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sup>[7]1314</sup>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不断地超越和更新旧的“均平”观念,认为平等是历史的、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他把平等观念扩展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男女平等到种族平等,从经济生活到社会地位。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就应该包括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关系。

毛泽东对传统“均平”观念的超越更是表现在他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公平平等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公平、平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之一,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实现它。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创造现实基础,而要是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去勉强实行社会公平的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sup>[9]</sup>毛泽东在理论上,对此也有过不少论述。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检验中国一切政党及政策主张的客观标准是“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sup>[10]</sup>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sup>[11]</sup>并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不能立足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现实,特别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他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经济“大跃进”等做法,目的在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当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计划经济的困惑和发展道路选择的不明确,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无法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他努力追求社会的公平,却造成了普遍的平均主义现象。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推崇的供给制、设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做法,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的空想色彩,是对传统

“大同”空想的回归。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回归”转瞬即逝,当毛泽东认识到了“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sup>[12]</sup>的时候,他深刻批判了人民公社中产生的“共产风”,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尽管他在实践中有重大失误,但是他在理论认识上的超越是不能否认的。

### 三、把传统的公有思想提升为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公有”原则是传统“大同”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则,也是传统“大同”理想的核心。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的最高原则,就是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天下为公”。到了近代,太平天国主张废除土地私有,“人无私财”,一切收归“圣库”,实行公有。但是,这种天王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天王洪秀全个人占有一切,这就为其所追求的公有制埋下了必然失败的伏笔。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构想的大同社会是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不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农、工、商各业均实行公有经营,从计划、生产到分配均由公政府掌管操作。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也全归公有经营。由于大同世界是遥远未来的幻影,是书斋中构思的精品,所以,康有为大胆设想的公有制形式虽是彻底的和健全的,但完全是十足的空想。孙中山向往天下为公,并以“天下为公”为座右铭。他曾认为解决现有社会问题的办法是“一则土地归为公有,一则资本归为公有。于是经济学上之分配,惟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分子之利,是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分子之利益,而资本家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孙中山是从现实社会问题入手提出“公有”问题的,他所提出的公有,实际上是控制私有的国有,并没有完全排斥私有制度。

青年毛泽东深受传统“大同”思想的影响,为其所描绘的高度公有的社会所感染。他曾设想“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sup>[6] 454</sup>他设想的“新村”计划显然以“公有”为其核心,但终因其为空想,脱离实际而根本无法实现,不久便被遗弃。但其美好的理想以及“公有”原则却并未被他遗忘,正是基于对这种理想的憧憬和

执著追求,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所阐明的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理论观点,强烈地吸引了毛泽东,并很快被他接受。他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理论和中国的必由之路以后,便抛弃了传统大同理想中的虚幻成分,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武器,在中国开始了为实现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历程。在这个奋斗的历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仅开辟了一条真正达到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的道路,即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时也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晚年毛泽东极力主张废除私有制,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把公有制程度的高低、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实行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标志。通过实践,他认为,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中应该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集体所有制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在他看来,在中国,这种转变是逐步的。转变的结构和态势,是经由生产小队至生产大队,再到人民公社这样的三级所有、小队为基础,然后逐步提高公有化程度,最后实现全社会生产资料的统一占有。尽管毛泽东晚年在实践中操之过急,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是他在理论及实践上将一种朴素的“公有”思想升华、提炼为一种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公有制度,在传统的公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巨大的超越,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

### 四、把传统的人道和谐原则发展为革命的人道主义

人道和谐是传统大同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伦理原则。一幅幅“大同”理想社会的构图,实际上是一宗宗充满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意味的温情画卷。康有为借助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重新阐发这一原则:“故只有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所谓君,无所谓国,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则人无所用其私,何必为权术诈谋以害信义?更何肯为盗窃乱贼以损身名?非徒无此人,亦复无此思,内外为一,无所防虞。故外户不闭,不知兵革,此大同之道,太平之世行之。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sup>[13]</sup>

毛泽东很向往友爱、互助、自由、共同劳动、共同享受、亲如一家的和谐与幸福的理想社会。毛泽东从小就同情弱者,经常和母亲一道背着父亲接济穷人。青年毛泽东曾笃信“新村”计划及追求的诗画般的共产主义,无不与他接受古代大同思想的人道和谐原则有关。当他投身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实现人类大同的时候,他将这种人道和谐的原则发展成为革命的人道主义。“革命人道主义”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的口号,它最早出现在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纪念白求恩写的“救死扶伤,实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中。“革命人道主义”虽说最初是作为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口号提出来的,但它绝不仅仅限于医疗卫生工作,而是一条重要的伦理原则,其作用范围是很广泛的,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把它运用到许多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对待群众,要做到尊重群众,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还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就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对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不骂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要求干部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不要摆架子,在群众面前要虚心,要做群众的小学生,要让人们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真正平等的。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做到“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sup>[14]</sup>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是错误的。毛泽东还勉励犯了错误的同志:“我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自己犯的错误,并且能改正,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sup>[15]</sup>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还把革命的人道原则用于对待不同阶级的人们,包括敌人和反动分子。他认为,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剥削阶级,面对整个敌对阶级,只能用斗争的方法而不能用人道原则。但对于不同阶级中的具体个人,却可以和应该采用人道原则。放下武器的敌人,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阶级与人民对立。而且,敌人营垒中的士兵,如日伪军以及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士兵,多是被强征入伍的,属于劳苦大众而不属于剥削阶级,从这一点来说,也应该用人道原则去保护、争取、团结他们。

当然,毛泽东在晚年对“阶级”的错误估计和随

意理解,使得自己在实践中逐渐背离了这些正确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反人道的行为。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对革命人道主义原则的理论上的论述超越了传统“大同”理想的人道和谐原则,它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基本最初级的道德要求。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在毛泽东的社会理想观中,既有继承,也有超越与发展。人类社会的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对社会实践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展提升。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该紧密结合实践,学习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观,这无论是对社会理想论的建设,或是夯实理想教育的理论基础,或是加强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老子.春秋[M]/梁海明.中华传世名著精华丛书.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20
- [2] 水渭松.墨子导读[M]/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成都:巴蜀书社,1991:163
- [3] 李安纲.儒教三经·礼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64
- [4] 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56:8
- [5]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13
- [6]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0-91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
-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 [1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71
- [12]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69
- [13] 康有为.礼运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240
- [14]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9-410
- [1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1

责任编辑:骆晓会